

回望如梦的六朝

六朝文史论集(二)

主编 李洪天

六朝文史论集(二)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  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

# 回望如梦的六朝

六朝文史论集(二)

主编 李洪天  
副主编 胡阿祥  
杨学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望如梦的六朝：六朝文史论集. 2 / 李洪天主编  
—镇江：江苏大学出版社，2013.10  
ISBN 978-7-81130-586-9

I. ①回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文化史—中国—六朝时代—文集 IV. ①K235.03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36023 号

回望如梦的六朝：六朝文史论集(二)

HUIWANG RUMENG DE LIUCHAO

---

主 编/李洪天

责任编辑/顾正彤 顾海萍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：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6464(传真)

网 址/<http://press.ujs.edu.cn>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句容市排印厂

经 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/890 mm×1 240 mm 1/32

印 张/16.875

字 数/442 千字

版 次/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81130-586-9

定 价/4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:0511-84440882)

## 前 言

四年前我们曾将“六朝研究”专栏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了《回望如梦的六朝——六朝文史论集》一书，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。四年來，专栏的特色愈加鲜明，学术质量稳步提升，学术新论层出不穷。这本新专集是专栏成果的再次荟萃。

每一次结集，便是一次对既往的总结。总结这四年，时间虽然不算太长，但是专栏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、有心可感的。可睹者，一篇篇精心编辑的高水平论文；可感者，乃贯穿于栏目的一种精神气质。论文固然重要，而我们更应看重的是其精神气质，它是专栏的灵魂，是未来发展前景的保证。这种精神气质，概而言之，主要是以下两点。

其一，开放的精神。蓝天和白云是天空的本色，但现在已是难得一见的美景。今天的学术，亦因名利所累，其本为天下公器的信念价值遭受动摇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六朝研究”专栏却能以开放的学术精神，面对来自各方、各种层次的作者，而不为各种私见所惑，为学术繁荣尽心尽力。据粗略统计，10年来，专栏共发文 142 篇（不含主持人语），其中教授和研究员的论文有 55 篇，约占 38.7%，博士和副教授的论文 54 篇，约占 38%，硕士和讲师的论文 33 篇，约占 23.3%。由此大体可以看出，专栏作者的年龄、职称和学历结构比较合理。结构合理的作者群既保证了专栏的学术品位和质量，也为专栏发展了学术后备力量。同时，专栏亦不为地域所囿，10年来，所发论文涵盖了日本、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，有时还

能将中、日、韩三国学者的成果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这种以学术交流为己任的做法，无疑也是专栏开放精神的重要体现。对这两方面，专栏主持人胡阿祥教授在最近的主持人语中也明确地指了出来，他说：“文章的作者，年龄则老、中、青，三代兼有，地域则北京、南宁、扬州、太仓、南京，来源广泛。然则一勺见海，片叶知秋，从 2004 年到 2013 年，已经 10 年的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》‘六朝研究’栏目的学术指向、作者队伍、发文数量，据此可明大概矣。”

其二，坚持探索创新。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。唯有探索，方有创新；唯有坚持，方有收获。探索和创新，对于“六朝研究”专栏来说，就是在栏目创办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和改进，以求其论文质量的不断提升和编辑机制的日臻完善；坚持，即坚持以敬畏学术的心态，以“特色鲜明，质量至上”的原则取舍稿件，持之以恒，守之有则。栏目自 1987 年起，算来已历 26 个春秋。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专栏名称几经调整，但“坚持探索创新”的精神却始终如一。整整 26 年！即使对一个刊物来说，26 年亦不为短，而对于一个栏目来说，恐怕更不多见。

当然，凝聚和坚持这种办栏精神是要有基础的，不能蹈空放言。“六朝研究”专栏创办 26 年有赖于选题优势、高端作者群体、学科支撑、编辑队伍、学界认同和学校支持等诸多基础因素。大家知道，六朝历史及文化与南京地域文化密不可分，同时它又与中国中古史魏晋南北朝段的学科研究紧密相连。也就是说，以六朝历史与文化为主题的“六朝研究”专栏，不仅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，而且还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。毫无疑问，有特色，彰显了专栏的与众不同；有学科基础，更为专栏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这是“六朝研究”专栏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。

一人之求火，不如众人之举薪。“六朝研究”专栏从创办之初到今天，一直有学术界新老朋友的呵护。对此，胡阿祥教授也已在

他的近期栏目主持人语中代我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：“特别需要感谢者，既往 10 年中慷慨赐稿与提出建议的同行，既往 10 年中给予信任与给予支持的朋友，以及当此 10 年志庆之际，对于‘六朝研究’专栏颇多褒奖、颇多勉励、颇多期望的中村圭尔、佐川英治、南恺时（Keith Knapp）、金秉骏、李凭、楼劲、范子烨诸位日、美、韩、中学界‘大佬’的题词与寄语！”

江苏省六朝史学会会长、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博士于“六朝研究”专栏功莫大焉！2004 年以来，他一直帮助我们主持“六朝研究”栏目。他和栏目的责任编辑一起策划选题，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，组织高质量稿件，认真地审定稿件和进行稿件深加工，除此之外，还给每期专栏写“主持人语”。其“主持人语”或谈选题，或论学术流变，或辨疑释惑，或画龙点睛，高屋建瓴、娓娓道来、启人心智。我们深感，专家主持栏目有助于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，统筹安排，瞄准前沿问题，循序渐进，分专题组稿，系统地推进六朝研究的广泛深入，引领学术方向。作为学报的主编，我谨代表编辑部同仁在此向胡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！

还要感谢江苏大学出版社的芮月英总编及本书的责任编辑，正是她们的热情帮助和精心编辑，这本论文集才得以及时、顺利出版。

李洪天

2013 年 9 月

## 目 录

前言	李洪天/001
论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	严耀中/001
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中的“成本”因素	严耀中/009
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谥号用字 ——魏晋南北朝官员溢法、溢号研究(二)	戴卫红/021
魏晋南北朝官员给溢程序 ——魏晋南北朝官员溢法、溢号研究(三)	戴卫红/030
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疆域及其分析	胡阿祥/043
西晋王朝建立及建设的两个问题	梁满仓/059
西晋的诸王封建与出镇	[日]辻 正博撰,杨洪俊译/066
北魏“天赐十王”考辨	刘军/087
萧梁部曲制的盛行及其影响	杨恩玉/099
《法宝联璧序》中所见之萧梁十八班制	刘畅/115
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败由奢” ——浙江长兴陈武帝故居“帝乡佛国”陈列展览之 “陈朝沧桑”部分文案	胡阿祥/133

孟昶事迹及其死因考	王永平/150
“深忌河洛暑热”与太子元恂之死	胡箫白/169
南朝的“苏侯”神信仰	权家玉/177
永嘉乱后京兆韦氏南迁江左考述	宋艳梅/190
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之崇尚儒家礼法及其表现	王永平 孙艳庆/201
走马楼吴简与孙吴时期的工商业	邱敏/215
走马楼吴简“叛走”考释	周能俊/225
《嘉禾吏民田家蔚》中的钱布准入米问题 ——以嘉禾五年大钱流行问题为线索	邓玮光/241
东晋南朝墓志俗字及其成因探析	朱智武/252
《大般涅槃经》在两晋时代的传承与流行	圣凯/263
南朝道经《三天内解经》再探	赵益/280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写作缘起与古代梦文化	王广勇/294
《建康实录》十二题	吴金华/304
“齐梁故里”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 ——兼论“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”的地望	张学锋/357
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 ——以建初寺的地点考证为例	张学锋/391

简论南京石头城的四个问题	王志高/401
镇江“晋陵罗城”命名问题的探讨	刘斌/422
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	邵磊/431
论丹阳陵口南朝石兽的制作年代	王志高/461
南京灵山梁代萧子恪墓的发现与研究	邵磊/475
附录：“六朝研究”栏目“主持人语”	胡阿祥/500

## 论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

严耀中

公元 589 年，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，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以南北分裂为主的历史时期，就此结束。如果说历史上充斥着偶然事件的话，这却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。

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，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。

### 一

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诸多分裂割据的局面，但促成统一的因素却在悄悄萌生。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动了语言文字的交流。“夫九州之人，言语不同，生民已来，固当然矣”<sup>①</sup>。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来，那么其言语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。而移民的往来打破了这种隔阂，因为移民和原住民之间总是要交流的，他们就会寻找出新的交流约定来。西晋后洛阳的正音“南染吴、越，北杂夷虏”<sup>②</sup>，及东晋长江下游扬州“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”，而且“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”<sup>③</sup>。与此相关的是，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本族语言也渐渐地在生活中消失。语言文字的统一成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前奏。

<sup>①</sup> 王利器：《颜氏家训集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 473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同①，第 474 页。

<sup>③</sup> 详见周一良《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》一文中的讨论，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》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5 年。

其次是生活习惯的混一，主要在于游牧习俗与农耕生活的相适应。本时期的民族问题，不是在边境上的攻战，而是在中土的如何相处。其民族融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步：第一是交往；第二是杂居；第三是普遍的通婚；第四是文化和行为准则的认同。对少数民族的上层，农业化和汉化是一致的。为了统治，他们要与汉族打交道，就会率先学习汉语言文字，如稽胡“又与华民错居，其渠帅颇识文字”<sup>①</sup>。这种结果是惊人的，“后魏初定中原，军容号令，皆以夷语。后染华俗，多不能通”，至北朝后期竟需“录其本言，相传教习，谓之‘国语’”！<sup>②</sup>接下来是文明感染，如士族的风气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，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，以致“药数动发”<sup>③</sup>。其中一个动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们在族群里的地位或威权。但这两者往往是同步的，尤其在下层。一旦下层族众也融通了，民族融合就难以逆转了。

再次是水陆道路的打通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军队的征讨，民众的迁徙，商人的贩卖，行僧的云游，都会把路走得更广。士兵、移民、商贩、僧人是魏晋南北朝最常见的，他们的往来带动了道路的发展，也形成了统一的条件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为了适应南征北战的需要，自曹魏起在水利上开始做两件事。一是配合大规模屯田的需要而修建灌溉系统，如当时“上引河流，下通淮颍，大治诸陂于颍南、颍北，穿渠三百余里，溉田二万顷”<sup>④</sup>。即使前燕这样的政权，也因屯田而“沟洫溉灌，有益官私，主者量造，务尽水陆之势”<sup>⑤</sup>。二是开凿或疏通了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，如白沟、平虏渠、泉州渠、新河、利漕渠、白马渠、鲁口渠、贾侯渠、讨虏渠、广漕渠、淮阳渠、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<sup>⑥</sup>。所以当时“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

<sup>①</sup> 令狐德棻，等：《周书》卷四九《异域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1年。

<sup>②</sup> 魏征，等：《隋书》卷三二《经籍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。

<sup>③</sup> 魏收：《魏书》卷二《太祖纪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<sup>④</sup> 房玄龄，等：《晋书》卷二六《食货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<sup>⑤</sup> 房玄龄，等：《晋书》卷一〇九《慕容皝载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<sup>⑥</sup> 王育民：《南北大运河始于曹魏论》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，1986年第1期。

河流域的水道,使长江、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”<sup>①</sup>。这些水道的开凿或疏通,无疑为隋代大运河的开通打下了基础,并使以后隋唐的大统一少了几分地理上的障碍。由此,尽管政治上是分裂的,经济交往却很寻常,证据之一就是诸朝的商业税越来越成为官方的重要收入。不仅“河桥孟津,解券输钱”,就是沿途旅舍,也对“交易贸迁”者“依客舍收钱”<sup>②</sup>,追求末利。东晋南朝更是如此。证据之二是南北之间还常设“互市”。早期如前秦苻健“于丰阳县立荆州,以引南金奇货、弓竿漆蜡,通关市,来远商,于是国用充足,而异賄盈积矣”<sup>③</sup>。后来北魏“又于南垂立互市,以致南货,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”<sup>④</sup>。地方上如魏崔宽为陕城镇将,以“恒农出漆蜡竹木之饶,路与南通,贸易来往,家产丰富,而百姓乐之”<sup>⑤</sup>。又如北魏占领淮河流域后,“江南无复鰐鱼,或有间关得至者,一枚直数千钱”<sup>⑥</sup>,但也有人一下子购得鰐鱼 30 枚,可见交易量还是不小的。即使在打仗时也未停止,如高季式“为都督,随司徒潘乐征江、淮间。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,还京,坐被禁止”<sup>⑦</sup>。而这种商业上的利益,致使北魏缘边州郡的官员“皆无防寇御贼之心,唯有通商聚敛之意”<sup>⑧</sup>。另一边如梁时“郁洲接边陲,民俗多与魏人交市。”<sup>⑨</sup>凡此,可见南北边境交易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。魏分东、西后,“士人仍缘姻旧,私相贸易”,虽有禁令,但“犯者非一”<sup>⑩</sup>,后来不得不放松。又如北齐“旧制,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。”<sup>⑪</sup>苏琼为徐州行台左丞,行徐州事后,听两淮通籴粮食,“遂得商估往还,彼此兼济,水陆

<sup>①</sup> 何德章:《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》,《武汉大学学报》,2004 年第 2 期。

<sup>②</sup> 房玄龄,等:《晋书》卷五五《潘岳传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<sup>③</sup> 房玄龄,等:《晋书》卷一一二《苻健载记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<sup>④</sup> 魏收:《魏书》卷一一〇《食货志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<sup>⑤</sup> 李延寿:《北史》卷二一《雀宽传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<sup>⑥</sup> 李延寿:《南史》卷二八《褚裕之传》,中华书局,1975 年。

<sup>⑦</sup> 李延寿:《北史》卷三一《高允传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<sup>⑧</sup> 李延寿:《北史》卷四七《袁翻传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<sup>⑨</sup> 姚思廉:《梁书》卷六《张稷传》,中华书局,1973 年。

<sup>⑩</sup> 李延寿:《北史》卷五五《郎基传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<sup>⑪</sup> 李延寿:《北史》卷八六《循吏传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。

之利，通于河北”<sup>①</sup>。这种情况当然是促进统一的因素之一。

最后落实在一统观念的强化。当时南北分裂，但交往频繁，南、北朝间国书往来，本来的套话是“想彼境内宁静，此率土安和”，后来为“欲示无外之意”而不分彼此，改成“想境内清晏，今万国安和”<sup>②</sup>，并取得南北一致的认同。至于深层观念上的趋同更是无微不至，如“正是北朝规制、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，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”<sup>③</sup>。又如“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后 50 年中（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，约公元 500—550 年），南北双方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共处的时期，文化交流频繁，装饰艺术风格，特别是装饰题材、造型及纹饰渐趋相近。如前述南朝墓室与北魏巩县石窟内顶装饰图案题材的一致、神王异兽等题材在北朝后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”<sup>④</sup>。审美上的一致也是价值观念趋同的形式之一。

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有了长期的和平稳定，关中和中原不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，而且是传统文化中心，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阳“始知衣冠士族，并在中原。礼仪富盛，人物殷阜”<sup>⑤</sup>。于是在物质与心理的支撑下，谁占有中原，一统天下之心就会油然而生，名正言顺的尊王攘夷之举总会使人跃跃欲试。魏孝文帝当年酒酣高歌：“白日光天兮无不曜，江左一隅独未照”，其臣下呼应，“愿从圣明兮登衡、会，万国驰诚混日外”<sup>⑥</sup>。这种豪情壮志苻坚有过，拓跋焘有过，但客观形势都未成熟。宇文邕灭北齐后统一的条件是具备了，但不幸早早病故。因此，杨坚建隋后的灭陈之策是这种意愿的自然延续。这些都说明，无论北方的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人，要求统一的主观愿望总是强烈的，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。

① 李延寿：《北史》卷八六《循吏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。

② 李延寿：《北史》卷五六《魏收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。

③ 杨泓：《关于南北朝时期青州考古的思考》，《文物》，1998 年第 2 期。

④ 钟晓青：《魏晋南北朝建筑装饰研究》，《文物》，1999 年第 12 期。

⑤ 范祥雍：《洛阳伽蓝记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，第 119 页。

⑥ 李延寿：《北史》卷三五《郑义传附郑道昭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。

## 二

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场景呢？在南边，自刘裕建立宋朝起，“以区区江东，蕞尔迫隘，荐之以师旅，因之以凶荒”<sup>①</sup>，在与北方的较量中，就逐步走下坡路了。刘裕是一个出色的统帅，但为了确保夺取东晋政权，他匆匆从前线返回建康，致使先机尽失，关中沦陷，元气大伤。宋明帝时，青、齐诸州又为北魏所有，大体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线。“南北朝对峙，其国势强弱之分界线大约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际而攻取青、齐之地一役。”<sup>②</sup>齐、梁两朝无大变动，缘淮为界而互有攻防，对峙下还能基本保持平衡，不过由于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后，两淮残破，无法成为北伐的基地，所以南朝多居守势。梁末由于侯景之乱，使继之而起的陈朝境土局限于长江之南，“西亡蜀、汉，北丧淮、肥，威力所加，不出荆、扬之域”<sup>③</sup>。江左政权赖以生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皆残破不堪，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六三“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条”云：“自晋氏渡江，三吴最为富庶，贡赋商旅，皆出其地。及侯景之乱，掠金帛既尽，乃掠人而食之，或卖于北境，遗民殆尽矣”。这样南朝就失去了与北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基础。

此外，对南方政权而言，蜀地雄居上游，有顺流而下之势；而保江必先保淮，淮地一失，不仅建康暴露，北军也能共得舟楫之利，故益、淮之失决定了整个陈朝不过苟延残喘而已。隋文帝所采纳的伐陈策中，就以“益、信、襄、荆、基、郢等州，速造舟楫，多张形势，为水战之具”<sup>④</sup>。一旦决定伐陈，蜀、汉两江北军轻舟直下，南军不重兵抵御，必乘势而进，如聚船与之决战，则江防空虚，武昌以下，都

① 李延寿：《南史》卷七《循吏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。

② 陈寅恪：《论隋末唐初所谓“山东豪杰”》，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232页。

③ 魏征，等：《隋书》卷二九《地理志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。

④ 李延寿：《北史》卷八六《循吏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可渡江，南方必顾此失彼。因此到了陈朝，统一的时日就取决于北方自身形势的发展了。

但从长远来看，南朝的积弱另有原因。东晋南朝的门阀，虽然起初也注意领兵，但毕竟来自文化世家，久之，必定重文轻武，兵人地位很低，士气不振。而北方少数民族历来尚武，北魏迁都洛阳后虽有所削弱，但到了北周、北齐时又得到重振。这种差异也是南北战争中南朝输多赢少的原因之一。次者，由于长期积淀影响和地域资源多寡所致，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高于江左，北朝所铸钱币的材质和品相亦好过南方诸朝所铸，这就是说在作为战争基础的人力、物力等物质条件上，北方也优于南方。再者，虽然北人惧暑，南人怕冷，似乎各有千秋，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，这也是南朝屡次北伐而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，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，后勤没有保障，军队是无法打仗的。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，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，挥师南下打过长江。因此，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，两淮至为重要，南军只有在此组建强大骑兵，备集足够的车马，方有希望克定河北。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想到、更难做到这一点<sup>①</sup>。因为“凡北人用骑兵，各乘一马，又有一马为副马”<sup>②</sup>，这当然十分有利于长途奔袭，但南方是难以弄到这么多的马匹的，直至魏晋之间，农耕区域的主要养马区“实在冀北”<sup>③</sup>，这个地区当然也归属北朝。何况当时北方骑兵已装备了马镫甲具，冲锋作战时更是势不可挡。北魏“自徐扬内附之后，仍世经略江淮。”<sup>④</sup>后来北齐曾“敕送突厥马数千疋于扬州管内”<sup>⑤</sup>，虽然其目的在于榨取当

<sup>①</sup> 宋孝武帝时周朗在其上书中曾提出如此建议：“今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，蠲一人役，三匹者，除一人为吏”，以此“办骑卒四十万”。但结果是“书奏忤旨，自解去职”。见《宋书》卷八二《周朗传》。

<sup>②</sup> 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〇七《晋纪》二九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。

<sup>③</sup> 房玄龄，等：《晋书》卷五一《束皙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<sup>④</sup> 魏收：《魏书》卷一一〇《食货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<sup>⑤</sup> 李百药：《北齐书》卷四三《卢潜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2年。

地土豪钱财,但南北骑兵基础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见,因此,北强南弱的局面也总是难以改变。

然则基于上述种种的分析与比较,等到隋朝建立后,由北方完成统一,就变得水到渠成了。

### 三

尽管儒家推崇王道与德化,但既然要大一统,就得用兵。在中国历史上简直见不到有和平统一的例子,即使是一方投降,也要到兵临城下的时候。就像晋灭吴的形势一样,隋朝结束南北朝的时候,又重复了南下统一的场面。

客观上是条件成熟,大势所趋,主观上是要建立功勋来巩固轻易得到的皇位,隋文帝于开皇八年(588)十月“命晋王广、秦王俊、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,以伐陈”<sup>①</sup>。十二月,南下诸军临江出发。

虽然从力量对比上看,由周军转化而成的隋军在灭北齐后士气正旺,而南军主力在吴明徹北伐后已丧失殆尽,隋伐陈是以石击卵,当无悬念,但隋还是十分慎重。首先在当年三月,一边遣使至陈试探虚实,一边颁诏罗列陈后主劣迹,以造舆论。此前,更是采用高颎的计策,因北方收割早于南方,屡屡在北边农事毕而江南正农收时顿兵临江,陈朝征兵防御,几年下来,废农困弊,又被麻痹;陈又不自量力地挑衅:“时后主与隋虽结和好,遣兵度江,掩袭城镇,将士劳敝,府藏空竭”<sup>②</sup>,更给了隋军动手的口实。其次隋动用兵力很大,“合总管九十,兵五十万八千,皆受晋王节度”<sup>③</sup>;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舰只,其中大者有楼五层,容战士八百人,南方已经没有水军优势。再次是多点渡江进攻,“东接沧海,西拒巴、蜀,旌

<sup>①</sup> 魏征,等:《隋书》卷二《高祖纪下》,中华书局,1973年。

<sup>②</sup> 魏征,等:《隋书》卷二二《五行志上》,中华书局,1973年。

<sup>③</sup> 同①。